

引用格式:刘灵辉,张迎新.农户社会阶层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农户土地依赖的中介效应[J].资源科学,2022,44(12):2525-2539.[Liu L H, Zhang Y X.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rmers' social class on their land transfer behavior: Based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armers' land depende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12): 2525-2539.] DOI: 10.18402/resci.2022.12.11

农户社会阶层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农户土地依赖的中介效应

刘灵辉,张迎新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摘要:快速城镇化的战略背景下,农户内部逐渐产生了分化现象而不再同质,这势必将深刻影响他们的土地流转行为,而土地的多重功能意味着农户的土地依赖很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探究农户社会阶层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以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起农户社会阶层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农户社会阶层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平均促进效应为4.05%。②农户的土地依赖在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其中,就业依赖与收入依赖的中介效应分别约为17.26%与16.00%。③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地区异质性,影响效应呈现出“西部>全国>中部”的态势,东部则无影响。本文结论不仅深化了有关农户社会阶层、土地依赖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关系的认知,丰富了既有理论研究,而且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社会阶层;土地流转行为;土地依赖;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农户;中介效应;中国

DOI: 10.18402/resci.2022.12.11

1 引言

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中国农业的经营格局呈现下面貌:共计约2.3亿的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其中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约有2.1亿户。从土地经营规模上来看,中国的普通农户可谓是“微农户”或“超小农户”。中国的小农经济亦是全球存在最长久和最大的小农经济体,也是“内卷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这无疑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现。故而,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改造传统农业,重组农村“人地钱”这三大生产要素,逐步

实现从落后的小农经营方式向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原则指引下,推进众多农户分散零碎地块的经营权向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成为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助力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农户在职业构成、收入水平、房产价值量、城镇融入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不断加剧,农户内部产生了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这必然深刻影响其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行为决策。农户社会分层将导致其土地依赖程度的差异,

收稿日期:2022-08-23,修订日期:2022-11-09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SC22EZD064);四川省软科学项目(2022JDR0163);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ZYGX2019J138)。

作者简介:刘灵辉,男,河南伊川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与政策。E-mail: liulinghui2005@163.com

通讯作者:张迎新,男,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行政管理。E-mail: 2710396124@qq.com

对于那些掌握较多财富资本与声望资本而处于社会上层的农户而言,更富足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职业生涯以及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意味着:一方面,土地对他们的就业功能、收入功能以及保障功能已经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对土地的价值认知逐渐从“情感认同”转向“经济理性”、从“土地崇拜”转向“工商精神”^[2]。于是,盘活土地资产以赚取经济收益,为其融入城镇、经商创业提供资金保障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

在学术界,关于农户社会阶层、土地依赖、土地流转行为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部分学者分析了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如陈成文等^[3]、徐美银^[4]指出,不同阶层农户所特有的阶层属性与阶层特点、对土地产权的不同偏好都影响着土地流转意愿;许恒周等^[5]、孙新华^[6]指出,不同阶层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甚至迥异的;贺雪峰^[7]更将不同阶层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分为3种:积极流出、维持现状、积极流入。②部分学者探讨了农户土地依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如刘灵辉等^[8]指出,土地依赖程度高会抑制农户流转土地的行为;张兰等^[9]指出,对土地依赖程度越低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的概率越大;杨晨丹妮等^[10]研究发现,对土地依赖程度高的农户,土地流转交易的弹性小,在土地流转中的权益实现程度较低;李国珍等^[11]采用PLS路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小,其流转意愿则越强。③少部分学者初步探索了农户社会阶层、土地依赖与土地流转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陈成文^[2]认为,土地依赖程度低的农户阶层,其土地流转的速度快,流转规模也大;徐美银^[4]指出,阶层分化中对土地依赖程度越低的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越强;梁栋^[12]指出,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以及对土地流转的态度等存在很大差别;苏群等^[13]则认识到农户社会阶层所引发的土地依赖变化,是其土地流转与否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经围绕农户社会阶层、土地依赖、土地流转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然而,有关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得到理论层面的澄清,更未涉及实证层面的检验。因此,本文以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三期(2014年、2016年、2018年)调查所得到的27个省份116个地级市135个区县438个村居共计11792个农户样本,围绕着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不仅尝试明晰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而且还尝试揭示影响产生的“黑箱”,验证农户对土地的就业依赖、收入依赖、保障依赖在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的因果关系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这能够有效弥补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在研究理论上,构建了农户社会阶层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框架,不仅明晰了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还探究了农户社会阶层通过弱化土地依赖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丰富与发展了既有理论研究,增进了学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知。②在研究方法上,在采用同期检验的基础上,选择异期检验作为因果识别策略,为研究假设提供了更加充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③在研究对象上,基于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农户样本进行分析,为理论假设提供了来自全国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与可推广性。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分层理论的三大源头是马克思的阶级划分、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和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分层,其根本差异在于分层标准^[14]。其中,马克思^[15]认为,决定社会个体阶层高低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韦伯^[16]主张应从财富、声望、权力这3个基本维度来综合考察社会分层;涂尔干^[17]则提出“分工分层论”,并通过社会分工的差异来界定阶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分层标准由一元(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生产资料占有与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立场)走向多元(测量指标的多样化与差异化)。在理论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有:陆学艺^[18]及其研究团队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提出的阶级分析框架,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为标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李强^[19]提出的划分社会阶层的10种资源,包含生产资料、财产、市场、职业、政治权利、文化、社会关系、主观声望、公民权力和人

2022年12月

力。然而,这些理论层面的社会分层研究仅停留在逻辑与价值的分析,而无法满足实证层面所需的变量操作化的要求,从而限制了进一步研究的推进。因此,学者从职业^[20]、收入^[21]、住房^[22]、消费^[23]、教育^[24]等诸多维度展开了社会分层方面的经验研究。在社会阶层结构由“身份制”分层向“资源占有制”分层的演化的过程中^[25],社会分层在实质上是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不均等分配,由利益分配方式和数量相近、利益地位相同的社会群体构成了社会阶层。故而,无论采取何种标准来对农户进行社会分层,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农户在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住房条件、社会保障、职业类型等方面或多或少是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类农户往往拥有更多的财富资本、更高的声望资本,凭借这些资本,他们更有能力、更有机会通过社会化分工从传统农业中脱离出来,步入边际回报率更高的二三产业。同时,农户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承包地对他们的就业、收入与保障功能越将让位于财产功能。他们可以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盘活承包地以赚取经济利益,助力其融入城镇并逐步实现“安居乐业”,或者至少可以使他们从“不得撂荒承包地”的责任义务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务工经商之中。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户社会阶层提升促进其土地流转行为,即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流转土地。

2.2 土地依赖的中介作用

土地之于农民具有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作用,是保证农民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保障制度是一种非正规与不健全的保障,并没有基本的保障标准和价值量的规定,甚至可以说是农民在农村社会保障缺位状态下被迫进行自我保障的局面^[26],但农地保障在转型期仍然是农村社会最大的稳定器,土地对农民而言具有生活保障、就业机会、经济收益、养老保障等多重功能^[27]。在此背景下,农户社会分层使其在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了显著的分化现象,对于处于上层的农户而言,他们融入到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变迁之中,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从事非农产业甚至举家迁移到城镇落户定居,其与土地渐行渐远^[28],土地的多重功能逐渐弱化,进而促

进了土地流转行为的产生。基于此,提出假设:

H2:农户社会阶层提升会弱化其土地依赖,即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土地依赖越低。

H3:农户土地依赖会阻碍土地流转行为,即农户的土地依赖越高,越倾向于不流转土地。

由于农户的土地依赖主要体现在就业、收入和保障3个维度,故而,本文从这3个维度对H2和H3进一步细化:

首先,就业功能弱化。社会阶层较高的农户,相较于较低的农户,往往具有更高的个人能力禀赋和更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更能适应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要求,顺利实现非农就业。随着他们在城镇中工作的日趋稳定,也就逐渐从半工半农的兼业农民走向非农职业的城镇全职职工,由亦城亦乡转为融入城市^[29],于是土地所承担的就业功能已经大幅弱化,甚至不复存在,此时,农户流转土地以获取租金收益就成为了理性选择。基于此,提出假设:

H2a:农户社会阶层提升会弱化其对土地的就业依赖。

H3a:农户对土地的就业依赖降低会促进其流转土地。

其次,收入功能弱化。在农民从事传统农业的比较收益持续下降的现实局面下,拥有财富资本和声望资本更多的农户,无疑会将其掌握的资源更多地投向比较收益更高的二三产业。这会进一步加剧其家庭收入结构“农业占比低,非农占比高”的局面,致使农民“厌农”情绪滋长,“离农”与“离土”的农民外流现象增多,土地流转意愿随之增强^[30]。基于此,提出假设:

H2b:农户社会阶层提升会弱化其对土地的收入依赖。

H3b: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降低会促进其流转土地。

最后,保障功能弱化。随着政府社保覆盖面的扩大,进城的农民工将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包括失业、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这将割断他们对土地的保障依赖^[31]。同时,社会阶层较高的农户,还会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提升自我的养老、医疗等保障水平,这使得他们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并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产生。基于此,提出假设:

H2c:农户社会阶层提升会弱化其对土地的保障依赖。

H3c:农户对土地的保障依赖降低会促进其流转土地。

基于上述农户社会阶层、土地依赖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关系的阐述,本文构建了分析框架(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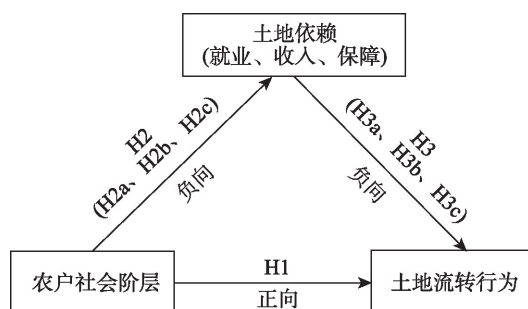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社会阶层、土地依赖与土地流转行为的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rmers' social class, land dependence, an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度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体现了个体所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是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之一,因此,基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参考中国本土的社会分层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遵循系统性、可比性、客

观性、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构建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共由2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构成(表1)。一级指标直接源自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由于一级指标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其进行了维度细分。细分的二级指标皆是对农户财富资本或者声望资本的局部测量,且指标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度与互斥性^①,因而分别具有独特的衡量优势。既有研究往往根据特定研究背景择其一,而本文则将其统筹纳入到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体系中,以全面反映农户对各类资本的占有情况,更精准测量和定位农户所处的社会层次。本文采用主观赋权(层次分析法)与客观赋权(熵权法)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具体而言,在对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将两种方法所得到的主客观权重进行等权重加权平均(0.5:0.5),从而获得综合权重。由此,通过专家经验基础上的理性判断与数据分布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的有机结合,实现赋权效果的优化^[32]。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测算模型如式(1):

$$SEI_{it} = 100 \sum_{j=1}^m W_j x_{ij} \quad (1)$$

式中: SEI_{it} 为样本农户*i*第*t*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W_j 为指标*j*的综合权重; x_{ij} 为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表1 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说明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财富资本(0.4036)	家庭人均收入	元	正向	0.0810	0.0301	0.0556
	家庭人均支出	元	正向	0.0497	0.0320	0.0409
	家庭耐用消费品总值 ^(a)	元	正向	0.0687	0.0897	0.0792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	元	正向	0.0839	0.0999	0.0919
	家庭房产总价值	万元	正向	0.2167	0.0553	0.1360
声望资本(0.5964)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正向	0.1376	0.0187	0.0781
	家庭城镇户口人数	人	正向	0.0682	0.1930	0.1306
	家庭人情礼支出	元	正向	0.0337	0.0460	0.0398
	家庭共产党员人数	人	正向	0.0735	0.1611	0.1173
	家庭工作单位编制人数 ^(b)	人	正向	0.1870	0.2742	0.2306

注:鉴于熵权法对数据极端值的敏感性特别强,本文对除家庭城镇户口人数、家庭共产党员人数、家庭工作单位编制人数之外较为连续的数据进行0.5%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使数据相对平滑。由于家庭共产党员人数与工作单位编制人数在2014年的问卷中未涉及,鉴于该变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采用邻近的2016年的调查结果予以填补。(a)耐用消费品,是指单位价格在1000元以上、自然使用寿命在2年以上的产品。(b)单位编制包含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国有企业编制3类。

① 经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10个二级指标的共计45个相关系数中,位于[0.0, 0.3]的有42个,位于[0.3, 0.4]的有3个,严格意义来说相关性关系极弱。

2022年12月

3.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采用“是否将土地出租他人”这一问题进行衡量,是为1,否为0。

解释变量:农户社会阶层,采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衡量,通过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量。

中介变量:农户土地依赖,包含就业依赖、收入依赖、保障依赖这3个维度。农户就业依赖,采用家庭务农人口占比(%)进行衡量;农户收入依赖,采用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进行衡量;农户保障依赖,采用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元,取对数)进行衡量。家庭务农人口占比与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农户对土地的就业依赖与收入依赖就越高;家庭商业保险支出越高,农户对土地的保障依赖越低。

控制变量:根据数据可得性,参考既有研究^[33,34],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为以下3类:①农户劳动力禀赋,采用家庭总人口(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家庭人均健康程度(李克特量表1-5)衡量;②生产要素禀赋,采用家庭农用机械总值(元,取对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衡量;③区位要素禀赋,采用村居城乡性质(城镇=1,乡村=0)衡量(表2)。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于2010年正式开展基线调研,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调查人口占除港澳台以外的全国总人口

的95%,可视为全国性的良好代表样本,并每隔两年进行一期追访。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2018年CFPS中的个人自答和家庭经济两方面数据,以农户为基本研究单位,样本包括生活在城镇与乡村且拥有土地(旱地与水田)的农户。经过多轮数据清理,最终保留27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香港、澳门和台湾)116个地级市135个区县438个村居共计11792个农户样本。这是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其中,2014年农户样本量为2816户,2016年为4416户,2018年为4550户。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为进一步描述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土地流转行为的现状,本文将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将年份分为2014年、2016年与2018年,通过柱形图展现了不同地区各年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土地流转率(图2)。可以发现:首先,就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平均值而言,各地区各年份都呈现增长态势,始终保持着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状况,这符合既有的普遍认知,即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稳步提升,但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距。其次,就土地流转率而言,各地区各年份也都呈现增长态势,但就年均增长率而言,呈现出中部最大(14.39%)、西部次之(12.11%)、东部最小(8.31%)的现象,这也是中部土地流转率在2014年之后超越东部的原因,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各地区的土地流转率仍然较低,意味着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总体而言,在各年份农户的社会经济指

表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11792	0.1615	0.3680	0	1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11792	8.1075	5.6806	0.0225	51.2544
家庭务农人口占比	11792	45.0232	31.6134	0.0000	100.0000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11792	0.0014	0.0023	0.0000	0.0100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	11792	1.5566	3.1282	0.0000	11.9704
家庭总人口	11792	4.1717	1.9251	1	21
家庭老年人口占比	11792	18.8504	31.3993	0.0000	100.0000
家庭人均健康程度	11792	3.0992	0.9838	1	5
家庭农用机械总值	11792	3.3023	3.9593	0.0000	13.4588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11792	2.1408	2.6398	0.0167	45.0000
村居城乡性质	11792	0.2450	0.4301	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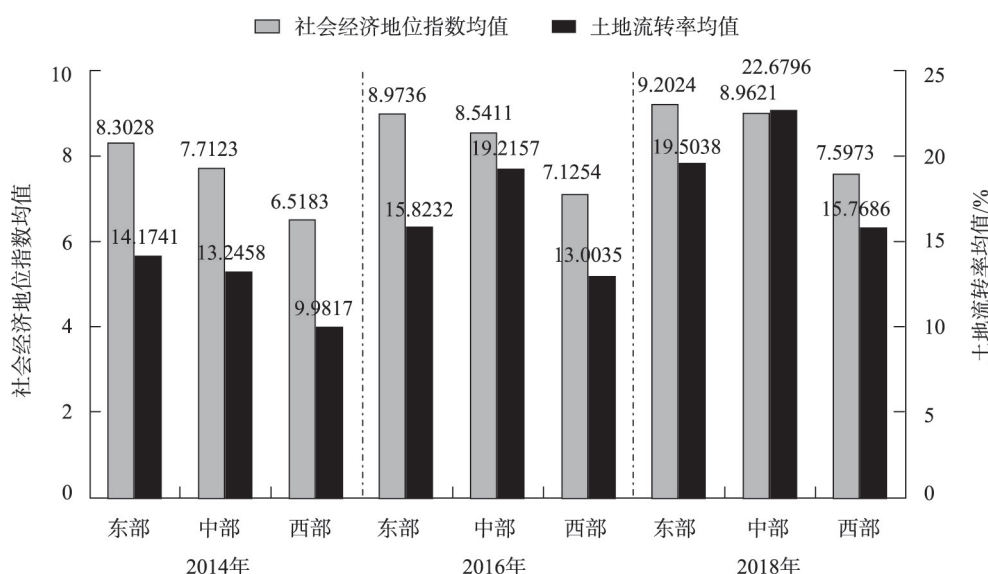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16和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土地流转率

Figure 2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and land transfer rate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2014, 2016, and 2018

数与土地流转率在各地区之间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这意味着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着地区性差异。

3.4 检验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目的,为检验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参考温忠麟等^[35]的依次回归方法,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sum \varphi Z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Me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 \sum \gamma Z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Y_{it} = \delta_0 + \delta_1 Me_{it} + \delta_2 X_{it} + \sum \theta Z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X_{it} 为解释变量——农户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Z 为控制变量; Me_{it} 为中介变量——农户土地依赖(就业依赖、收入依赖与保障依赖); μ_i 与 λ_t 分别为省域与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地区差异与时间趋势的影响;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α_0 、 α_1 、 φ 、 β_0 、 β_1 、 γ 、 δ_0 、 δ_1 、 δ_2 、 θ 为待估参数。模型(2)检验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总影响,模型(3)检验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依赖的影响,模型(4)检验农户土地依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通过以上模型的逐次回归,可以明晰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此外,考虑到农户的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农户的社会阶层与土地依赖,农户的土地依赖与土地流

转行为之间,都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进而导致模型估计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当期变量估计的同期检验之后,采用滞后变量估计的异期检验,即在估计模型(2)–(3)时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而在估计模型(4)时使用滞后两期的解释变量与滞后一期的中介变量。由此,不仅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增强估计结果的可信度,也可以作为稳健性检验增加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假设提供充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展示了模型(2)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应用逐步回归法,在不同方程中分别纳入控制变量与双向固定效应的不同组合,进而观察解释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回归系数的敏感性。结果显示,一方面,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都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结果较为可靠;另一方面,相较于当期,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系数几乎相等,表明即便使用更能反映因果关系的异期检验,结果仍然稳定。

从更能彰显因果关系的列(6)可以得出,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农户土地流转的概率就提升0.50%,H1成立。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均值为8.1075,因此可知农户社会阶层

2022年12月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1)	(2)	(3)	(4)	(5)	(6)
当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44*** (0.0007)	0.0057*** (0.0008)	0.0051*** (0.0008)			
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45*** (0.0011)	0.0053*** (0.0012)	0.0050*** (0.0012)
家庭总人口		-0.0067*** (0.0022)	-0.0074*** (0.0022)		-0.006*** (0.0030)	-0.0074*** (0.0031)
家庭老年人口占比		0.0011*** (0.0001)	0.0010*** (0.0001)		0.0012*** (0.0002)	0.0010*** (0.0002)
家庭人均健康程度		0.0138*** (0.0039)	0.0132*** (0.0039)		0.0090 (0.0055)	0.0078 (0.0056)
家庭农用机械总值		-0.0094*** (0.0009)	-0.0096*** (0.0009)		-0.0094*** (0.0013)	-0.0100*** (0.0013)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0.0064*** (0.0020)	0.0063*** (0.0021)		0.0059** (0.0026)	0.0059** (0.0027)
村居城乡性质		0.0576*** (0.0106)	0.0549*** (0.0108)		0.0776*** (0.0146)	0.0730*** (0.0149)
省域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常数项	0.1260*** (0.0070)	0.0836*** (0.0189)	0.0965*** (0.0193)	0.1390*** (0.0099)	0.1050*** (0.0276)	0.1230*** (0.0280)
观测值	11792	11792	11792	5743	5743	5743
Adj-R ²	0.0050	0.0410	0.0600	0.0040	0.0420	0.066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在农户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表中控制变量、双向固定效应都已控制。下同。

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平均促进效应为4.05%。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农户社会阶层位置的跃升,不仅意味着农户的收入水平、现金及存款数额、房产总价值等财富资本的集聚,而且还意味着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员数量、城镇户口人数等声望资本的积累。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户,越渴望摆脱农业的束缚、并努力实现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故而对他们而言,承包地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财产功能上,因此,将土地转出可以获得“劳动力释放”和“经济收入增加”的双重利好。同时,理性选择下的土地流转,可以使他们借助土地流转引发的职业结构变动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以实现阶层地位的继续上向流动^[36]。

4.2 影响机制检验

虽然通过基准回归结果分析,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验证,然而,对

于因果关系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农户社会阶层是否是通过弱化土地依赖,进而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呢?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究竟是通过弱化农户对土地的哪一依赖进而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呢?为检验H2和H3,本文应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2)–(4),分别对就业依赖、收入依赖、保障依赖进行回归估计。下文各表中,列(1)–(3)皆为同期检验的估计结果,列(4)–(6)皆为异期检验的估计结果,列(1)与列(4)皆为基准回归结果。

4.2.1 就业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4展示了就业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户社会阶层显著弱化了就业依赖(列(2)与列(5));另一方面,农户就业依赖显著阻碍了土地流转行为(列(3)与列(6))。由此可知,H2a与H3a成立。就业依赖在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

表4 就业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mployment dependence

变量	(1)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2)家庭务农 人口占比	(3)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4)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5)家庭务农 人口占比	(6)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家庭务农人口占比			-0.0031*** (0.0001)			
当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1*** (0.0008)	-0.4900*** (0.0583)	0.0036*** (0.0007)			
滞后一期家庭务农人口占比						-0.0019*** (0.0003)
滞后两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39* (0.0021)
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0*** (0.0012)	-0.4540*** (0.0867)	
常数项	0.0965*** (0.0193)	65.2800*** (1.6910)	0.3010*** (0.0214)	0.1230*** (0.0280)	63.6500*** (2.3990)	0.2560*** (0.0511)
观测值	11792	11790	11790	5743	5743	1943
Adj-R ²	0.0600	0.1410	0.1230	0.0660	0.1430	0.1000

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充当了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比约为17.26%(以列(4)-(6)为据)^②。具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农户家庭务农人口占比就减少0.4540%,进而间接使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概率增加0.0863%^③。农户的社会分层,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农户在职业类型与就业结构等方面的分化,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农户凭借着家庭禀赋与社会关系网络的优势,可以较早脱离边际回报率较低的农业生产活动,融入到城镇化的浪潮之中,实现非农职业的自由流动。随着农户家庭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持续性的转移,农户将实现财富资本与声望资本的进一步集聚与积累,进而产生一种正向反馈,促使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的渠道更加宽广,最终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将极大减少家庭关系对农户融入城市的牵制^[31]。在此过程中,农户对土地就业依赖的降低使得其无需为家庭成员的日后就业途径担忧,可以放心大胆地将土地流转出去。

4.2.2 收入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5展示了收入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

果显示,一方面,农户社会阶层显著弱化了收入依赖(列(2)与列(5));另一方面,农户收入依赖显著阻碍了土地流转行为(列(3)与列(6))。由此可知,H2b与H3b成立。农户收入依赖在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充当了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比约为16.00%(以列(4)-(6)为据)。具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长1个单位,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就减少0.00004%,进而间接使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概率增加0.08%^④。根据《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2019)》中数据显示,2018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近70%,加上经营净收入中二三产业增加的净收入,3项合计近90%^[37]。可见在现今,农业收入占比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局面,农业收入对农民而言可谓“微不足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按照“比较利益”优势流动的规律,财富资本更多、声望资本更高的农户会选择将其拥有的各类资本和资源配置到比较效益更高的产业领域,以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之中。这将

② 由于本文以更能反映因果关系的异期检验估计结果为假设判定的依据,因此,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中,逐步回归过程分别包含了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这导致中介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的计算可能存在些许误差,但仍然可作为大致的参考。

③ 由于列6中表明,滞后一期家庭务农人口占比每减少1%,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概率就提升0.19%,因此,当前者减少0.4540%时,后者就增加0.0863%。

④ 由于列6中表明,滞后一期家庭农业收入占比每减少1%,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概率就提升2033%,因此,当前者减少0.00004%时,后者就增加0.08%。

2022年12月

表5 收入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income dependence

变量	(1)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2)家庭农业 收入占比	(3)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4)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5)家庭农业 收入占比	(6)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23.0900*** (1.2950)			
当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1*** (0.0008)	-0.0001*** (0.0000)	0.0039*** (0.0008)			
滞后一期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20.3300*** (3.9060)
滞后两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38* (0.0021)
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0*** (0.0012)	-0.00004*** (0.0000)	
常数项	0.0965*** (0.0193)	0.0019*** (0.0001)	0.1410*** (0.0195)	0.1230*** (0.0280)	0.0015*** (0.0001)	0.1690*** (0.0468)
观测值	11792	11792	11792	5743	5743	1944
Adj-R ²	0.0600	0.1250	0.0790	0.0660	0.0860	0.0930

使处于较高社会层次的农户家庭收入更加倚重于工资性收入以及来自于二三产业的经营收入,使农业收入占比在这类家庭中进一步降低。随着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逐步弱化^[38],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也可能随之发生。

4.2.3 保障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6展示了保障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虽然同期的中介效应检验过程(列(1)-

(3))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但是异期检验结果却未通过检验。虽然列(5)表明农户社会阶层弱化了保障依赖,验证了H2c,但列(6)中滞后一期家庭商业保险支出的系数并非显著为正,H3c并未得证。遵循更能反映因果关系的异期检验的估计结果,本文认为,虽然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可以提升家庭商业保险支出,但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对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仍然有待商榷,并未像

表6 保障依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ecurity dependence

变量	(1)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2)家庭商业 保险支出	(3)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4)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5)家庭商业 保险支出	(6)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			0.0038*** (0.0013)			
当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1*** (0.0008)	0.1850*** (0.0074)	0.0044*** (0.0008)			
滞后一期家庭商业保险支出						0.0046 (0.0033)
滞后两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43** (0.0022)
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50*** (0.0012)	0.1550*** (0.0109)	
常数项	0.0965*** (0.0193)	-0.3240** (0.1470)	0.0977*** (0.0193)	0.1230*** (0.0280)	0.0654 (0.2170)	0.1360*** (0.0462)
观测值	11792	11792	11792	5743	5743	1944
Adj-R ²	0.0600	0.1630	0.0610	0.0660	0.1290	0.0840

家庭务农人口占比与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一样得到充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可能原因是:虽然既有研究已经发现,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可以增进商业保险支出,这主要是由于阶层地位的提
升不仅带来了提高安全感的需求,而且更能担负购买商业保险的成本^[39]。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这在农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此限制了农户土地保障依赖弱化对土地流转行为促进效应的充分释放。首先,根据2016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CLDS),持有商业养老或健康保险的受访者比例仅占7.7%,可见,中国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极低。其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虽然中国商业保险市场规模在逐步扩大,保险密度从1980年的0.47元/人提高到2020年的3500元/人,保险深度从1980年的0.10%提高到2020年的4.45%,然而,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最后,在本文11792个农户样本中,仅有20.74%的农户购买了商业保险,绝大多数农户根本不存在购买商业保险的行为。而在这20.74%的农户中,虽然商业保险支出的均值达到了4287元,但中位数仅为2790元,内部的标准差达到了6678元,不同农户间的差距悬殊,这意味着即使在这些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户中,大多数农户的商业保险支出也较低。

4.3 地区异质性检验

现状描述中,本文发现了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土地流转率在地区层面所表现出的不一致性,为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会随地

区而异,特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表7)。可以发现,一方面,对于东部,只有当期社会
经济地位指数显著,而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则不显著;另一方面,对于中部与西部,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都至少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且西部的影响效应远大于中部,分别为0.76%与0.44%(以列(4)、列(6)为据^⑤)。由此可知,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而言,在东部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在中部、西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且西部的影响效应将近是全国平均效应(0.50%)的1.52倍,而中部则仅为全国平均效应的88%。出现这一地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西部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仍然偏低,2018年西部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均值分别比中部、东部低15.23%、17.44%,2018年西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处于5以内的农户占比分别比中部、东部高8.77%、10.68%,2018年西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处于10以上的农户占比分别比中部、东部低9.11%、8.38%。故而,西部通过提高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推动土地流转还有较大潜力;而中部虽然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平均值仍然低于东部,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为0.2404,故而,中部通过提升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促进土地流转的效应处于缩小阶段。

4.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多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不仅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更检验

表7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变量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1)东部	(2)东部	(3)中部	(4)中部	(5)西部	(6)西部
当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40*** (0.0014)		0.0038*** (0.0014)		0.0072*** (0.0012)	
滞后一期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25 (0.0021)		0.0044** (0.0023)		0.0076*** (0.0019)
常数项	0.0986*** (0.0358)	0.1120** (0.0512)	0.1260*** (0.0382)	0.1750*** (0.0569)	0.0679** (0.0280)	0.0880** (0.0410)
观测值	3750	1818	3449	1693	4593	2232
Adj-R ²	0.0550	0.0710	0.0550	0.0530	0.0680	0.0650

⑤ 为对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的系数进行组间比较,本文也尝试在模型中纳入地区变量(东部为1,中部为2,西部为3)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滞后一期交互项的系数为0.0023,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农户社会阶层的影响效应由东向西递增,与分组回归结果相差不大。

2022年12月

影响机制的稳健性。首先,控制地区差异。由于中国不同省域、市域乃至县域之间在社会文化、地形面貌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因此,在地区固定效应中采纳更为细致精确的县域固定效应,以作为省域固定效应的替换(表8)^⑥。其次,替换解释变量。由于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测算结果出现

偏差,无法准确衡量农户的社会阶层,因此,使用均权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并重新测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表9)。

表8与表9展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了异期检验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控制地区差异,还是替换解释变量,各列中解释变量、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原有估计结果的差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控制地区差异)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controlling for regional differences)

变量	(1)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2)家庭务农 人口占比	(3)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4)家庭农业 收入占比	(5)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6)家庭商业 保险支出	(7)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滞后一期家庭务 农人口占比			-0.0020*** (0.0003)				
滞后一期家庭农 业收入占比					-17.1300*** (4.1570)		
滞后一期家庭商 业保险支出							0.0044 (0.0034)
滞后两期社会经 济地位指数			0.0021 (0.0021)		0.0023 (0.0021)		0.0025 (0.0022)
滞后一期社会经 济地位指数	0.0038*** (0.0012)	-0.4300*** (0.0897)		-0.0001*** (0.0000)		0.1300*** (0.0108)	
常数项	0.1020*** (0.0283)	64.7300*** (2.468)	0.2300*** (0.0511)	0.0016*** (0.0001)	0.1370*** (0.0475)	-0.0578 (0.213)	0.1060** (0.0469)
观测值	5743	5743	1944	5743	1944	5743	1944
Adj-R ²	0.1340	0.1880	0.1970	0.1520	0.1870	0.1910	0.1810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解释变量)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replac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变量	(1)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2)家庭务农 人口占比	(3)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4)家庭农业 收入占比	(5)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6)家庭商业 保险支出	(7)农户土地 流转行为
滞后一期家庭务 农人口占比			-0.0020*** (0.0003)				
滞后一期家庭农 业收入占比					-17.2700*** (4.1560)		
滞后一期家庭商 业保险支出							0.0046 (0.0033)
滞后两期社会经 济地位指数			0.0016 (0.0019)		0.0015 (0.0019)		0.0017 (0.0020)
滞后一期社会经 济地位指数	0.0043*** (0.001)	-0.3900*** (0.0814)		-0.00004*** (0.0000)		0.1280*** (0.0089)	
常数项	0.1150*** (0.0286)	65.5700*** (2.5310)	0.2300*** (0.0527)	0.0017*** (0.0001)	0.1390*** (0.0491)	-0.4410** (0.2130)	0.1060** (0.0485)
观测值	5743	5743	1944	5743	1944	5743	1944
Adj-R ²	0.0660	0.1880	0.1970	0.1520	0.1870	0.1990	0.1810

⑥ 即使采纳市域固定效应结果并无差异。省域包含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市域包含所有地级市,县域包含所有县级市(县)和地级市辖区。

异并不大。社会阶层、就业依赖与收入依赖均仍然显著,而保障依赖则仍然不显著。这表明本文固定效应选择以及赋权方法较为科学有效,增强了经验证据的说服力。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构建了农户社会阶层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而后以CFPS调研的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全国代表农户为例,构建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应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内在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研究发现:

(1)农户社会阶层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随着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其将更倾向于流转土地,平均促进效应为4.05%。

(2)农户的土地依赖在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不仅直接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还将通过弱化农户对土地的就业依赖与收入依赖,进而间接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二者的中介效应分别约为17.26%与16.00%。

(3)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并无明显影响,中部和西部则具有明显影响,且影响效应呈现出“西部>全国>中部”的态势。

5.2 政策建议

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地区间却存在着异质性。中部促进效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部则未产生显著促进效应。这意味着未来在提升农户社会阶层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可能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共同发力,以助力提升土地流转率的目标:①因地制宜地创新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之间的土地流转模式,例如,“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农户”,通过土地流

转模式创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进而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参与度;②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健全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将“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嵌入运用到传统的土地流转交易管理中,实现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的便捷录入、及时发布、适时查询^[40],降低土地流转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助力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农户社会阶层能够直接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且可以通过弱化农户对土地的就业依赖与收入依赖,进而间接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那么,未来打通城乡关系,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破除农民向上流动所受到的固有体制和结构因素的制约和掣肘,进而突破“阶层固化”,实现更多农民向上流动甚至跃层发展,无疑是未来促进土地流转所必须深入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①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消除农民进城落户所面临的“户籍壁垒”,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户实现进城落户,提升家庭成员城市户口人数占比,增加农户的声望资本,进而促进土地流转。②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需要使更多的农户基于宅基地退出、宅基地及地上房产抵押等制度政策实现在城镇购买“商品房”的梦想,提升家庭房产总价值,增加农户的财富资本,进而促进土地流转。③拓宽农民就业渠道,通过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国际劳务输出、城乡创业等多种途径,降低农村失业率,以避免农户社会阶层下滑而导致其对土地的就业依赖和收入依赖的“回升”,进而阻碍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④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着单一性^[41],且社会保障程度仍然偏低,土地对农户的福利保障功能仍然存在,进城农户仍将承包地作为规避非农就业风险的途径之一,而购买商业保险的开支并非普通农户都能够承担的,故而,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应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农户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广大的低收入农户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打消他们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是未来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亟需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黄宗智. 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J]. 开放时代,

2022年12月

- 2020, (4): 126–139. [Huang Z Z.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and “involution” and “de-involution”[J]. Open Times, 2020, (4): 126–139.]
- [2] 陈成文. 农村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 5–11. [Chen C W. On influence of land circulation to the rural social strat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07, (1): 5–11.]
- [3] 陈成文, 赵锦山. 农村社会阶层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选择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 (10): 37–40. [Chen C W, Zhao J S. 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choice of land transfer in rural social classes[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8, (10): 37–40.]
- [4] 徐美银. 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意愿: 基于江苏省泰州市387户农户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 2013, (1): 56–66. [Xu M Y. A study on the farmer rural land transfer desire causing by different stratum and special fondness for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3, (1): 56–66.]
- [5] 许恒周, 郭忠兴.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94–98. [Xu H Z, Guo Z X. Theoretic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erarchy differenti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preferenc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3): 94–98.]
- [6] 孙新华.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 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 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 (4): 77–83. [Sun X H. Land circulation and farmer household budget: A comparison of two circulation model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 village in Jiangxi Province[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2, (4): 77–83.]
- [7] 贺雪峰.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J]. 社会科学, 2011, (3): 70–79. [He X F. The analysis of rural social classes after the abolition of agricultural taxe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3): 70–79.]
- [8] 刘灵辉, 刘燕. 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实现过程中的博弈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9): 150–157. [Liu L H, Liu Y. A game-theory based research in the family farm to realize land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28(9): 150–157.]
- [9] 张兰, 冯淑怡, 陆华良. 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形成机理: 基于农户微观决策视角[J]. 江海学刊, 2016, (5): 61–73. [Zhang L, Feng S Y, Lu H L. Mechanism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farmland suppliers’ decision-making[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16, (5): 61–73.]
- [10] 杨晨丹妮, 洪名勇. 土地流转中的农民土地权益实现研究: 基于农民主体性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 (3): 21–37. [Yang C D N, Hong M Y. 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of farmers’ land interests and rights in farmland transf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farmer’s subjectivity[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 (3): 21–37.]
- [11] 李国珍, 张应良, 易裕元. 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8(3): 88–99. [Li G Z, Zhang Y L, Yi Y Y. The influence of welfare compensation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transferring the land into capital[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48(3): 88–99.]
- [12] 梁栋. 土地流转、阶层重构与乡村振兴政策优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5): 1–11. [Liang D. Land transfer, class remodel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optimizat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17(5): 1–11.]
- [13] 苏群, 汪霏菲, 陈杰. 农户分化与土地流转行为[J]. 资源科学, 2016, 38(3): 377–386. [Su Q, Wang F F, Chen J. Rural-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and land transfer behavior[J]. Resources Science, 2016, 38(3): 377–386.]
- [14] 齐明珠, 王亚. 中国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分层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 (6): 110–123. [Qi M Z, Wang Y. Research on the socio-economic stratific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21, (6): 110–123.]
- [15]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Marx K, Engels 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Six[M].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Works Compilation Bureau, Tran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1.]
- [16] 马克思·韦伯, 著.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I) [M]. Yan K W,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17] 埃米尔·涂尔干, 著. 社会分工论[M]. 渠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M]. Qu D, Trans. Beijing: Life. Reading. XinzhiSanlian Bookstore, 2000.]
- [18]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Lu X Y. Research Report on Social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M].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 [19] 李强. 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J]. 学海, 2006, (4): 40–46. [Li Q. An analysis of ten standard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J]. Academia Bimestris, 2006, (4): 40–46.]
- [20] 朱战辉. 论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 农民分化的视角[J]. 人文杂志, 2018, (9): 122–128. [Zhu Z H.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village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8, (9): 122–128.]
- [21] 杨书超, 葛道顺. 社会阶层、健康水平与家庭保健消费: 基于

- CFPS2018的实证研究[J]. 消费经济, 2020, 36(4): 58–66. [Yang S C, Ge D S. Social Class, Health level and family health care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2018[J]. Consumer Economics, 2020, 36(4): 58–66.]
- [22] 李骏. 城市住房阶层的幸福感与公平感差异[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1(1): 46–57. [Li J. The difference of happiness and justice perception in urban housing stratum[J].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31(1): 46–57.]
- [23] 杜旻. 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结构及地区差异[J]. 西北人口, 2013, 34(3): 15–19. [Du M. Migrants'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13, 34(3): 15–19.]
- [24] 孙秀林. 一个城市, 两个世界: 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社会分层[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 (8): 75–82. [Sun X L. One city, two worl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xternal population in Shanghai on their residential segregation[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21, (8): 75–82.]
- [25] 刘涛. 中西部地区农民社会分层的类型、关系及功能研究[J]. 理论导刊, 2021, (12): 46–53. [Liu T.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types, relations and functions of farm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2021, (12): 46–53.]
- [26] 王东进.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Wang D J.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M]. Beijing: Law Press, 2001.]
- [27] 李长健, 张兵, 袁蓉婧.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 兼论农民权益保护问题[J]. 农村经济, 2009, (5): 27–29. [Li C J, Zhang B, Yuan R J.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of rural land and the perfec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Also on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J]. Rural Economy, 2009, (5): 27–29.]
- [28] 朱冬亮. 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 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7): 123–144. [Zhu D L. Farmers are getting ever more distant from the land: Land transfer and the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system[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0, (7): 123–144.]
- [29] 田保传. 不容忽视农民工二代就业难点[J]. 探索与争鸣, 2008, (3): 10–10. [Tian B C.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annot be ignored[J].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08, (3): 10–10.]
- [30] 徐美银. 农民工市民化、土地价值需求对转出意愿的影响: 基于4省9市137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8(2): 8–19. [Xu M Y. The influence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land value demand on the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ou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1371 questionnaires in 4 provinces and 9 cities[J].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18(2): 8–19.]
- [31] 黄贻芳, 钟张宝. 城镇化进程中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构建[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1): 13–18. [Huang Y F, Zhong Z B. Exit Mechanism for rural land contracting and management rights in urbanization process[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14(1): 13–18.]
- [32] Zhang Q Z.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R]. Amsterdam: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Energy, Environment and Chemical Science, 2016.
- [33] 阿布都热合曼·阿布迪克然木, 石晓平, 饶芳萍, 等. “三权分置”视域下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户产权认知视角[J]. 资源科学, 2020, 42(9): 1643–1656. [Abudikeranmu A, Shi X P, Rao F P, et al. Tenure integrity, security, and farmland transf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Based on farmers' perception of land tenur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9): 1643–1656.]
- [34] 李立朋, 丁秀玲, 李桦. 资源支持视角下关系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 以黄河流域为例[J]. 资源科学, 2022, 44(3): 450–463. [Li L P, Ding X L, Li H.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n the land transfer of farming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support: An example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3): 450–463.]
- [3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Wen Z L, Ye B J.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 731–745.]
- [36] 陈成文, 罗忠勇. 土地流转: 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4): 5–10. [Chen C W, Luo Z Y. The land pass: A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countryside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06, (4): 5–10.]
- [37] 魏后凯, 黄秉信.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8–2019)[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Wei H K, Huang B X.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hina's Rural Economic Situation (2018–2019)[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9.]
- [38] 吴雪婧, 于小兵, 钱宇.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 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 (6): 46–60. [Wu X J, Yu X B, Qian Y. How do natural disasters affect farmers'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data[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 (6): 46–60.]
- [39] 何晓斌, 徐旻霞, 郑路. 中产阶层的金融投资行为: 基于社会经济压力多重调节的探索[J]. 社会发展研究, 2022, 9(1): 210–224. [He X B, Xu M X, Zheng L. Does the middle class participate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more? Multiple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pressure[J].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22, 9(1): 210–224.]
- [40] 刘灵辉. 慎用“不在地主”概念: 兼论保护进城农民土地合法权

益[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 70-78. [Liu L H. The concept of "Absentee Landlord"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land right-sand interests of rural migrant farmers[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6): 70-78.]

[41] 徐俊峰, 葛扬. “城乡共富”: “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20-28. [Xu J F, Ge Y. “Urba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e practic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6): 20-28.]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rmers' social class on their land transfer behavior: Based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armers' land dependence

LIU Linghui, ZHANG Yingx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gradually occurred between farmers in China, which is bound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land transfer behavior. Meanwhile,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land mean that the dependence of farmers on land is likely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and transfe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armers' social class on land transfer behavior, this study took Web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farmers' social class on land transfer behavior, and used and us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model to test the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ree-period panel data.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social class of farmer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occurrence of land transfer, with an average promotion effect of 4.05%. (2) The land dependence of farmers played a mediation role i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land transfer, among which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employment dependence and income dependence are 17.26% and 16.00%, respectively. (3) There was a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class of farmers an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and the impact presented a pattern of western region > national > central region, while no effect was observed in the eastern part. This study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social class, land dependence, an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and enriches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Key words: social class; land transfer behavior; land dependenc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armers; mediation effect; China